

November 2012

## A Critical Survey of the Researches on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Xiuming Wu

Tao Zhang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

### Recommended Citation

Wu, Xiuming, and Tao Zhang. 2012. "A Critical Survey of the Researches on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32, (6): pp.53-60.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2/iss6/1>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 当代文学文献史料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 ——基于现有成果的一种考察

吴秀明 章 涛

**摘 要:**当代文学文献史料作为一种新的史料形态,尽管在总体上明显处于滞后状态,但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艰难探索,从认识到实践两个方面都取得了成就。本文拟以现有成果为契入点对当代文学文献史料的历史与现状进行全面考察,具体论述有三:首先,着重就纵向历时性层面归纳梳理学界在文献史料问题上所经历的主观认知嬗变与研究范式的调整;其次,主要从横向共时态维度对它在史料搜集、整理与辨析等方面取得的成果进行清理和盘点;最后,是在纵横分析基础上,从文献史料角度对如何“重建”当代文学提出自己的思考。

**关键词:**当代文学 史料 文学史

**作者简介:**吴秀明,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领域:中国现当代文学。电子邮箱:zjuwx180@hotmail.com;章涛,浙江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读博士。电子邮箱:eudeimon2010@hotmail.com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当代文学文献史料问题研究”[10AZW005]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A Critical Survey of the Researches on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Abstract:**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serve as a new form of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in general, the research in this field lags behind, although in the past half century some remarkable progresses have been made in both understanding and practice. The paper takes the current achievements as a start and reviews the present scholarship in the study of contemporary literary materials. First, the evolution of cognition in the researchers and the adjustment of research approach become emin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achronic analysis and delineation. Secondly, the current studies in the area have been examined on the synchronic dimens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ata differentiation and archiving. Lastly, the paper summarizes the analyses on the current studies and reflects on the ways to reconstruct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in the light of the researches on historical materials.

**Key words:**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historical materials literary history

**Author:** Wu Xiuming is a professor at Chinese Department,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0028), focusing on research into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Email: Zjuwx180@hotmail.com.

**Zhang Tao** is a Ph. D. student in Chinese Department at Zhejiang University, majoring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Email: eudeimon2010@hotmail.com.

推动文学研究前行的根本因素是“思想观念”与“文献史料”,这可以说是20世纪文学研究经验给予我们的最深刻启迪。然而,由于1949年以来风云变幻的社会环境的影响,也由于自身学科年轻化、幼稚化的规约,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却呈现出了另外一种发展状态:被别的学科视为支撑研究“阿基米德点”的文献史料,在这里有意无意地被忽视和放逐了,取而代之的是大同小异的“思想阐释”。翻检以往数量惊人的作家作品、文学思潮和文学史论等著述,我们发现它们在历史观、价值观和艺术观等方面尽管存在着不小的差别,但彼此在研究的基本框架

和思路上却往往具有惊人的相似或一致之处。如此这般,就使得当代文学研究和文学史的编写在驰骋和凸显思想观念的同时,普遍沾上了好发空论、言之无物的弊病,并由此及彼地影响到自身的学术品格和学科地位。为什么经常有学者质疑当代文学研究的存在价值,我以为是可从中找到原因的,至少与此不无关系。

当然,这样说并无意于否定前辈学者和同行时贤在这方面的艰难付出及其取得的成就。谢泳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学科建立中,不是没有史料工作,而是没有完整和系统的史料工作,零散的工作引不起学界的重视”(谢泳,

“当代文学史”75)。哪怕是在“思想观念”睥睨一切的年代,毕竟还有一些学者逸出时代主流框架,用有异于思想资源的历史还原的方法对此做出了探索,为我们现在启动的带有某种“完整和系统”性质的当代文学文献史料工作打下了基础。文学史料作为人类精神的一种存在方式,它是不应也不会抹灭的;对于当代文学史料研究者来说,目前的主要任务也许不是讨论它的有无及其价值程度如何,而是站在时代的高度如何合历史、合逻辑地给予总结,并充分调动和运用多种手段和方法予以整合和提升,有的还要采取非常手段进行抢救的问题。当代文学不同于现代文学,它的文献史料更加丰富,也更为散乱,它也不像现代文学已有不少名家对此作过比较全面、深入与系统的研究。因此,面对散落一地的文献史料,我们在激发强烈责任感的同时,不能不深感任务的艰巨。

本文拟以现有成果为契入点,对当代文学文献史料的历史与现状进行全面考察。当代文学研究可资探讨的问题很多,学者见仁见智,彼此也有不少歧义。但强调文献史料之于文学研究的重要性,强调经过长期的脚踏实地的努力逐步建立当代文学文献史料学,这在学界大致已有共识,对于具有六十年历史的当代文学来说也很有必要。

## 一、主观认知的嬗变与研究范式的调整

我国文献史料有源远流长的历史和丰富的经验积累,在长期的文学活动中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其实证的功力和成果也令后人瞩目。鸦片战争以来,部分学人提出以政治文化运动为基础的文学史料研究思路(刘增杰201-08),五四时期,受胡适“整理国故”运动的鼓动和影响,顾颉刚、钱玄同等一批学者在传统朴学“无证不信”的基础上,以西方实证哲学为核心,构建了一套相当完备的“史料整理”范式,为传统的史料工作注入了现代的学术内涵。但随之而起的战争却阻断了史料工作的前进脚步,建国后知识分子忙于应付政治整风和批判运动,在高度紧张的社会环境里很少能分心顾及史料的收集、整理,更别对之进行了研究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放国门引入大量西方理论,催就了新一轮“以论代史”的“泛理论”倾向,这不但影响了当时的整个学风,而且在客观上也给当代文学文献史料工作造成了一定的遮蔽。

真正对我国文献史料展开系统反思与建构的,还是始于八十年代末的现代文学学科,朱金顺、马良春、樊骏、刘增杰等在前人搭起的学科“脚手架”上开始了颇为艰辛的攀登,提出了现代文学文献史料的大体方向、体系性构架与操作方式,且均获得了不俗的成就:朱金顺的带有“填补空白”性质的研究现代文学文献史料的第一部论著《新文学资料引论》,从传统实证研究的角度对现代文学史料作了较为详解的梳理、考据和分类;谢泳的《中国现

代文学史研究法》特别指出对于借鉴古代、现代、朴学、实证主义方法,搜集、整理和发掘涉及“运动”、“知识分子心态”的原始材料及内在的价值(谢泳,《现代文学史》42);还有钱理群提出的现代文学在辑佚、整理与鉴别与古代文学不同的新问题,以及建立自己的新规范、原则与方法;<sup>①</sup>黄修己对于史料工作“我思故史在”、“史在促我思”的主体意识的强调,注重理论与述史的结合;<sup>②</sup>特别是樊骏的洋洋八万字的长文《这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以详尽的实例分析了现代文学文献史料工作的现状和未来应该采取的各种措施,为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建构描划了基础的框架设计图;刘增杰在2012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中提出“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体系是围绕着史料存在的新形态展开的”这一观点,并力图以此完成“体系性的知识架构”,将现象研究更进一步升华为历史研究,成为近期现代文学史料研究的重镇。

现代文学文献史料“新思潮”的兴起,不能不深深地影响与之具有血缘关联的当代文学。为了缩短学科差距,也是为了改变自身滞后的研究现状,当代文学文献史料研究在开始之初就不得不从思维理念到具体方法等各个方面努力向现代文学、古代文学寻求借鉴。当然,当代文学之所以在九十年代初紧随现代文学之后提出了史料学问题,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来自自身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这里所谓的“内在要求”,借用最早发表“当代中国文学史料学研究笔谈”的《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与信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刊)“编者按”的话来说,就是“旨在加强当代文学研究的科学性”,“为当代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打下坚实的基础并提供可能的新的起点”。显然,这里既带有一定“无奈”和“苦恼”的成份,同时“还包含研究者对这一学科自身基础建设之薄弱抱有的遗憾”(“面对历史的挑战”3)。这种情况,自然也决定了当代文学文献史料研究从“启动”的那天起,就隐含了它的难以抹灭的自我个性特质。而这一切,恐怕只有返回到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语境中才能得到合乎情理的解释。

众所周知,当代文学的重要特征在于与政治意识形态紧密缠结,特别是在建国初至“文革”之际,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学的侵渗逐步达到顶峰,文学活动涉及的方方面面都被有目的地吸收进了“泛政治化”结构之中,与政治整风和大批判运动密切相连。文学与政治之间形成的这种依附关系,遂使政治意识形态成为文学评价的唯一合法标准,而文学自身的独立品格则被扭曲甚至取消。因此在“文革”结束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当代文学文献史料乏人问津。这不单是因为在当时的研究者看来50—70年代的文学创作没有留下经典文本和可以称之为文献史料的东西(这些文献史料大多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政治文件和领导人报告、讲话),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认知的背后体现了当时学界整体史料意识的匮乏。应该承认,八十

年代是一个崇尚思想而且确实也需要思想的时代,毕竟我们国家和民族刚从一个封闭压抑的时代中走出,正面临着思想上的严重“饥荒”。问题在于当大批知识分子涌入广场进行启蒙主义批评和民族文化反思时,却鲜有人注意到他们所栖身的“学院”也在历史巨变后累积了重重问题,特别是基础性研究几乎完全停滞,这使得当代文学学科在八十年代的“思想热”背后透露出了某种危险的“失衡”。

在十年激情过后,当学者由广场重回岗位,他们发现,“当代文学与当代政治几乎是同构的,这一文学与政治的同构性给当代文学史料涂上了浓重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吴秀明 赵卫东 50),史料研究也因此受到意识形态层层阻力的同时与中国政治权力话语紧密联系起来,成为“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吴秀明 119);另一方面,建国“前三十年”的文学也并不像以前所想象的那样是一片荒漠,“失态和非常态的文学”始终“公开地或隐秘地存在着”(谢冕 30)。换一个角度来看,这种政治意识形态对于文学话语的干涉反而为我们探究知识分子文人心态、重绘中国特色的文艺体制提供了分析的原始材料。也就是说,中国当代独特的文学“制度”,要求人们从一个更为广阔的视野对当代文学活动做出有效发言,而传统的史料经验以及由此衍生出的研究范式已经无法容纳这一复杂的当代文学深层结构。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看到姗姗来迟的当代文学文献史料不是以单独的个体面貌出现,而是往往通过与其他话语资源的互动来展示事实存在的意义。李洁非指出,1949年后的当代文学“应重视‘物的属性与结构’”,因为“在我们文艺中最终面对的不是人而是物:体制、政策、形势、运动,等等。过去,作家作品的成败,一般从其自身找原因,而在当代,必须从社会总体找原因”(李洁非 3-4)。当代文学从某种意义上不是作家作品史,而是“事件史、现象史、问题史”,它与普通文学史诉诸于“价值”的发现与鉴别不同,研究的重心应转移到“关系”的发掘、辨析和阐释上(王春林 202)。比如解读《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就可将考察重点移至“王蒙与秦兆阳之间,评论家与作者之间,对文稿修改的不同意见”上(王本朝 128),探寻其背后蕴含的微妙复杂的文学-政治社会学规定性因素。常识告诉我们,当代文学作品的版本变迁“主要不是来自刻印、抄写的偏差,而是由于时代意识的偏离,是思想和观念的不同而造成的版本差异”(王本朝 164),某种意义上说,版本变迁体现的是作者本人与政治话语之间的“关系”。因此,“研究作品的修改、订正以及类似的问题[……]将有助于我们认识文学作品之中的漏洞、不一致、转折和歪曲等与文艺批评有关的问题”(韦勒克 沃伦 88)。李洁非也正是通过爬梳、辨析包括秦兆阳、韦君宜、黎之等亲历者留下的相关史料文献,在《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修改、发表和几起几落的批判“谜案”中

发现了当代文学作家、作品与国家政治变化间充满“戏剧性”的“历史缩影”关系。<sup>③</sup>显然,这样一种分析往往是传统史料研究所没有,也是很难完成的。

前文提到,当代文学因为学科年轻化、幼稚化及其独特的生存状况,有时甚至给人以未经时间检验的某种“不稳定”之感。唐棣、施蛰存等之所以反对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此。如今,以怎样的观点和视角来考量这些“历史的材料”,建构符合当代文学学科特点的史科学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有研究者曾对此分析:“我们不能孤立地将史料抽离出具体而复杂的历史背景为我所用,而是将其作为历史的史料放到‘历史’中去”(王俊 166),“不是以自己的价值立场随心所欲地剪裁历史,而是尽可能地还原历史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寻找更多的被遗忘的历史记忆”(武新军 270)。也就是说,在研究工作中我们不但需要将史料小心谨慎地“翻译”至产生它的语境加以考察;同时,“历史化”的进程又伴随着研究主体不断的“历史祛魅”。换言之,我们一方面要站在时代的高度关注史料工作,在杂多的现象中探寻其本质,以彰显史家之卓识;另一方面又要对史料存在的外部话语体系报以一定的警惕,充分注意那些非本质存在的合理价值和存在之必要,并不因与本质相异就被抹去,也不因“反本质”而将其无限放大。<sup>④</sup>

因此,促进史料与思想之间动态平衡,超越二元对立,反对任何一种极端倾向的“当代新考据”就不仅成为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而且也成了当下不少学者的一种理性选择。如洪子诚通过史料与文化的“互证”及“双向”打通来解读郭小川“面对‘革命’要求放弃个体的精神独立时”的矛盾,<sup>⑤</sup>吴俊对《人民文学》这个“与新中国共生的国家最高文学刊物”思想价值与意识形态设计的研究等。<sup>⑥</sup>总之,当代文学史料工作借助于开阔开放的“大文化研究”思路与方法,将文本置于更大的话语空间和场域,从体制等各个层面梳理和发掘当代文学内外之间的复杂关联。它的“再次发动”,有其深刻的必然性,表明当代文学研究正在产生潜在而又深刻的变化与转型。

## 二、现有研究成果及其历史评价

当代文学文献史料在形态、内容和存在等各个方面都具有明显的差异,这使我们很难将其成果的评价纳入一个完整统一的表意结构中,而只能根据主旨的需要人为地作些切分。这种切分,粗略而论,大致可分前后的两个“三十年”。

在当代文学的“前三十年”,尽管宽泛地讲,史料工作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已经开始启动了,但由于诸多原因,它所取得的成果非常有限,文学圈子内外真正比较自觉而又有意地进行文献史料保存的十分稀少。“民间史料收藏者”赵一凡在十年动乱中保存了大量“地下”

文学资料,不少手抄本就是从他这里流传出去;由他发起的民间文学“沙龙”为那个暗色的文学时代带去了一抹希望。同样属于有意识的史料整理收集活动,还有童怀周整理编辑的《天安门诗抄》,<sup>①</sup>其存在的意义也不亚于是一次对爆发的民间声音的“抢救”,该诗抄因此成为了研究“文革”的一份重要的文献史料。当然这样的情况在“前三十年”不是很多,并且“赵一凡们”的收藏毕竟只是一个带有特例性质的个体行为;作为来自民间的普通知识分子,他们不可能也无法完全逾越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这就不仅使其文献史料收集的范围比较狭窄,成果大多无法公开发表,同时还存在着随时被体制“清理出局”的危险。更何况在赵一凡逝世后,由他多年细心收藏、编辑、保存下来的大量文学资料遗失和破坏的情况十分严重,如果没有徐晓和鄂复明的抢救,几乎要完全毁失。

此外,由于当代文学与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关系,“如果当代文学史缺少了政治领导人对《武训传》、《草木篇》、《沙家浜》、《李自成》的直接干预或批判的记录,对‘中国特色’的当代文学史的把握就会失之肤浅”(吴秀明 赵卫东 52)。当代文学史料的独特之处在于,大量与文艺运动有关的史料以文件、政治报告、领导人讲话、批示的形式保留在当时中央报纸与杂志以及机关内刊上,特别是如《人民日报》这种虽非文学类报刊,但却因为其特殊的背景,积极参与了历次当代文学思潮、文艺运动,成为了“前三十年”史料的重要“集散地”。这类史料还存在一种“变形”,即以文学思潮汇编或大学教材的形式,编辑、整理、收录当时的批判文章出现。<sup>②</sup>它们往往直接与当时的文艺批判运动联系,且在一个模本问世后会大量“翻印本”。<sup>③</sup>另外,扩大化的反右运动与随后的十年“文革”,几乎所有被“打倒”的作家或知识分子都写有个人自白或组织申辩书,甚至还有作者自己记录的生平年表以及作家在“平反”后政府发布的各类“平反”文件也都应该进入当代文学文献史料研究。<sup>④</sup>

需要注意的是,对“前三十年”史料的系统考察主要集中并延后在“后三十年”这一时期进行;相比较于前期的零散、混乱、变形,从八十年代末尤其是从九十年代开始,当代文学文献史料也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春天”(樊骏 65)。“后三十年”当代文学文献史料成果主要以综合性的史料汇编为主,同时,在现存史料收集、整理与辨析方面,也取得了不少阶段性的成果。

第一、当代文学史料成果最直观也是比较突出的表现是各类“史料选”的出版。早在1983年,北京师院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就编纂了《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选》一、二卷,收录自1949年毛泽东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到1981年唐达成、唐因奉命撰写的对《苦恋》的批判文章《论〈苦恋〉的错误倾向》,以及胡耀邦就电影问题所作的《坚持两分法,更上一层楼》讲话。也许与时代背景有关吧,翻检这本最早出版的选本,我们可

以发现它所选入的史料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1995年,谢冕、洪子诚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选(1948—1975)》,打破了当代文学的上限,自1948年开始收录重要的、对当代文学产生影响的文献史料。随后,洪子诚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史料选》(1945—1999)两册,再进而将入选史料的时间在上、下两个维度做了延伸,以更为开放而又理性的态度体现了对文学历史连续性的理解。如编入1945年舒芜的《论主观》作为研究早期“胡风派”以及后来所谓的舒芜“叛变”的重要文章,这类史料的人选有助于我们超越狭隘的道德,对历史问题有更客观的评价。路文彬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料文论选(1949—2000)》则在史料选择上做了较好的平衡处理,选本中既有郭沫若《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这样意识形态性很强的文艺领导人讲话,也有吴晗《论历史》这样历史进程中的异质声音,既有《文艺报》的《题材问题》和《“写中间人物”是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这样在同一家刊物刊出的前后矛盾的政策性史料,也同时兼顾新历史主义、先锋主义和女性主义这样带有明显奇异特色的思潮性史料。而与路文彬从“文论”角度切入不同,吴秀明近期主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与史料选》下卷(即当代文学卷)<sup>⑤</sup>着重从文学史角度审视,它不仅收录毛泽东、周扬等针对文艺问题讲话或报告的“公共性”史料和沈从文日记等“私人性”史料,而且为了反映和体现当代文学的世界性特点,还遴选了苏联日丹诺夫、德国顾彬以及唐小兵等有关“域外”史料,力图在多维宏阔的视野下对当代文学作根源性的还原。

还有,中国文联及有关组织从八九十年代开始编纂的《新文艺大系》和《新文学大系》等大型书系也都有《理论史料集》、<sup>⑥</sup>《史料卷》。<sup>⑦</sup>这些集子(卷),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可看作是一种“史料选”,因此,完全可以纳入本文所说的史料成果的范围。

综合性的史料汇编,除了“史料选”这样按年代收集的资料外,引人注目的还有多卷本大部头的各类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如八十年代开始推出,由茅盾作序,各大专院校合作编纂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现已出版80多种,全套丛书计划共200余种);中国小说学会主持编选的《中国当代作家研究资料》丛书;孔范今等主编的《中国新时期新文学史研究资料》、《中国新时期文学思潮研究资料》;丁茂远等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参阅作品选》(12卷)等。这些研究资料(尤其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被认为“填补了解放以来文学研究工作中的一个空缺”(茅盾语),至今仍对当代文学研究发挥重要作用。二十一世纪初出版的《中国当代作家研究资料》和《中国当代作家评传》(丛书)也延续这一编写体例,努力“引领读者深入地认识作家及其写作的全貌,达到对作家的人生经历、行为方式、精神品格和艺术境界的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谢有顺 61)。除此以外,还有贾植芳、陈思

和主编的《中外文学关系史资料汇编》上、下二册；刘福春主编的《新诗纪事》、《中国新诗书刊总目》；<sup>④</sup>於可训等主编的《中国文学编年史·当代卷》；张学正等主编的《文学争鸣档案——中国当代文学争鸣实录（1949—1999）》；刘增人等编纂的集资料汇编与总体研究为一体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史论》<sup>⑤</sup>等等。

第二、在新史料的发掘和抢救方面也取得了一批阶段性成果。这里又分三种不同的情况：一是研究者对未发掘史料的钩沉，像杨健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廖亦武的《沉沦的圣殿》、杨鼎川的《1967：狂乱的文学年代》、李润霞主编的《潜在诗选》（3卷），特别是陈思和主编的《潜在写作文丛》（10卷），他们对“地下文学”和“民间文学”史料的发掘就属于这种情况。如果说前文提到的“赵一凡们”是非常时代史料保存的功臣，那么“陈思和们”则是对这些史料的用心开发和利用。二是当事人对往昔历史的追忆，这类史料一般以回忆录的形式出现，出版的如刘锡城的《在文坛边缘上——编辑手记》、张光年的《文坛回春纪事》、韦君宜的《思痛录》、黄秋耘的《风雨年华》、《舒芜口述自传》、诗人哑默自行整理的《真与美》史料等。<sup>⑥</sup>另有在《新文学史料》、《百年潮》、《档案天地》、《文史杂志》、《出版史料》、《炎黄春秋》、《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与信息》（内刊）等刊物上披露的各种新史料——如黎之在《新文学史料》上提供的对于周扬、林默涵和胡乔木的第一手材料，<sup>⑦</sup>王增如、蒋祖林所写的丁玲在被打为右派时的有关行为举止等等。<sup>⑧</sup>三是对“活史料”的抢救，在现阶段，它主要通过“口述历史”的方式来谋求实现，虽起步较晚，但“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今，一批自觉运用口述史方法的文学史著作已经浮出历史地表”（陈全黎 151），包括蔡彻对黄药眠的采访、<sup>⑨</sup>陈明对丁玲生涯的回忆、<sup>⑩</sup>周艾若对于父亲周扬人生经历的回忆、<sup>⑪</sup>傅光明等人对老舍之死的调查，<sup>⑫</sup>另有陈徒手的《人有病，天知否——1949年后中国文坛纪实》和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等等。

上述这些史料的钩沉向我们披露了以前所不知的诸多历史内情，为今天如何还原历史，更好地评价和解读当代文学及其作家作品提供切实的史料支撑或在场证言。特别是第二种类型的史料发掘，因为它源自于历史的亲历者或知情人（大多是第一手史料），具有较大的真实性和权威性。但毋庸讳言，这之中的确存在一个内涵的平面单调的问题（如有些回忆内容多诉苦而少反思），有的甚至在撰写或“口述历史”过程中有意无意地制造史料错误或盲点。这也提醒我们在对待此类史料时，同样需采取客观理性的态度，任何的薄视或轻信都是不合适，也是不可取的。

第三、在史料钩沉、发掘的同时，还有一些学人开始将其纳入研究的视域中进行考辨、甄别并有所创获。虽然在这方面取得的成果并不多，起步的时间也比较晚，但

就整个当代文学史的发展和史料学的建设而言则非常重要，因而更有必要值得重视。众所周知，史料存在的形态各异，其存在的来源也各不相同，记载史料的人与解读史料的人发生“错位”很容易导致史料的误读，或干脆“误用”；对于“原始史料”的忽视也极易导致史料的“以讹传讹”。这些都需要现在的学人们对它们加以分辨和考察。事实上排除错误史料、匡正当代文学史料的基础架构，也正是当代文学文献史料建设应有的题中之义。在某种程度上，它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对于新史料的发现，而新的史料也必须要经过一番考证确认之后才能真正进入研究视野。

史料考辨、甄别工作的难度大，工作量繁重，且需要过硬而又多方面的综合素养。在考证的过程中，研究者应该放开眼光，通过参考、比对其他史料，由缜密的实证上升到综合研究，去伪存真，刊谬纠偏。首都师范大学霍俊明在博士论文《当代新诗写作问题研究》第二章《当代新诗史写作的史料问题》中集中讨论了各本文学史中的诗歌史料问题，所考证的都是当代诗歌史中被引用十分集中频繁、或历来视为“正确”的史料。如他指出某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将牛汉发表于1984年前后的作品如《车前草》、《华南虎》、《悼念一棵枫树》等直接归于八十年代的写作成果加以具体论述，却忽视了这批诗歌实际上写成于七十年代作者被流放五七干校时期，“由于写作时间和写作背景的不同，这些诗作的文学史位置和意义自然有着相当大的区别”（霍俊明 88），不能再置于八十年代的语境下加以解读。类似的情况，还有李润霞对于“潜在写作”的史料的勘误；<sup>⑬</sup>宋剑华对于十七年经典《铁道游击队》背景的考察；<sup>⑭</sup>陈子善对于“潜在写作”史料的反思；<sup>⑮</sup>刘福春对于自己早先新诗史工作的严肃自审<sup>⑯</sup>等等。

在如今“理论”（准确地说是“西方理论”）横行的情况下，尽管史料爬梳、考辨、甄别工作往往吃力不讨好，没有得到应有的肯定，但它涉及的都是当代文学最基本的历史事实（如作家作品，出版年代，作品修改等），有些还关系到对作家作品在文学史地位上的评价，所以马虎不得，也敷衍不得，因为“这些工作实际上已经超越了单纯的技术性操作，而进入综合分析判断的思考过程，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学术性”（樊骏 71）。事实上，上述有关史料考证的本身，已经体现了学人们对于史料工作的重视和自觉态度，它表明了当代文学研究已经发生并且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变化。

## 结语：提出当代文学的重建问题

以上挂一漏万地对当代文学现有文献史料成果匆匆作了梳理。最后，借此机会再次申明，当代文学文献史料研究工作尽管有不少收获，但总体来讲成就是不高，它

不仅不能与古代文学、现代文学相比,也明显滞后于现有的研究实践。特别是在当代的“前三十年”,更是如此。要改变这种现状,当然需要多方面的共同努力,但业内同行的高度重视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当代文学文献史料作为一种新的史料形态,它有一般史料的共同性,又有自身的特殊性。从前者出发,需借鉴现代文学尤其是古代文学的一套传统,而恰恰在史料考辨方面,“在古典文学的研究中,我们有一套大家所熟悉的整理和鉴别文献史料的学问,版本,目录,辨伪,辑佚”(王瑶 16)。从后者出发,则又不能简单地照搬古代文学的经验做法,而应根据时代生活和研究工作的实际,探寻和建构适合自己学科特点的文献史料学体系。就此而论,目前当代文学文献史料研究任重而道远,它只是开了个头。

前些年,裘锡圭先生有感于基础史料在当下研究中的重要性以及忽视史料可能造成的错误学术判断,曾经提出“古典学的第二次重建”问题(裘锡圭 4)。古典学等传统学科况且如此,在这方面没有多少积累的当代文学就更有一个“重建”的问题。当然,这里所说的“重建”并非排斥或抛弃“思想阐释”应有的理性观照和把握,倡导一种无思想的所谓的“纯知识”研究;而是返回到“论从史出”这一基点上,进行“重新出发”,强调研究的“实事求是”与“实事求是”的研究,一切结论或论述皆有所本(文本),皆有所据(史料)。借用雷蒙·威廉斯的话来说,就是“任何一种形式的分析都必须建立在对历史形态分析”的基础上,通过文献史料文本去接近历史现场,发现“这些文本与历史场景有着深厚及共谋性的关联”(转引自薇思瓦纳珊 36)。落实到具体的研究范式上,就是强调实证研究与综合研究的结合,即在确定事实的基础上,进而去把握事实背后的错综复杂的因果联系。因为大量事实表明,不管我们怎样“客观”,当代文学“重建”不可避免地隐含了研究者的当代立场,“重建”本身就是在“当代性”与“历史性”的对话关系中展开的,并且是它们彼此对话的产物。

当代文学文献史料浩如烟海,实在太多,与政治历史相伴生、不断批判否定的特点,使其较之其他学科显得更为复杂,鱼龙混杂、真假参杂的现象也十分突出。如果只是“深入历史”而不“跳出历史”,有效地借助于理性的思想之光去照亮历史、激活历史,那么它不仅很难进行史料发掘、整理和研究,甚至可能为太多太复杂的史料“迷恋”而导致自身在史料中“迷失”。从这个意义上,历史与当代,或者说史料与思想是一对孪生体,它们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我们是不能也不应将它们分离切割来看的。所谓的当代文学“重建”,恐怕只能作这样理解。也只有如此,我们才有可能在史料与史料、史料与思想的冲突对话中,寻找到最接近历史原貌并为今天人们所认同的情境和方向,为当代文学学科构建一个更高也更为坚实的学术平台和起点。

## 注释[Notes]

①钱理群:“重视史料的‘独立准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3(2004):82-91。

②黄修己:“现代文学研究的史论关系的再认识”,《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2005):1-5,90。

③李洁非:“谜案辨踪:《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前前后后”,《长城》3(2009):162-73。

④笔者认为,当代文学史料是一个只有起点而没有重点的巨大复杂存在,并非所有史料都能反映真实、本质的历史。请参考吴秀明:“当代文学学科建设与史料意识的自觉”,《福建论坛》8(2011):117-21。

⑤洪子诚通过阅读《郭小川全集》,试图从中发掘环绕在作家身边的社会压力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这种压力又是怎样转化为驱动当事人不断反省和写作的内部压力。参考洪子诚:“历史承担的意义”,《我的阅读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30。

⑥吴俊、郭战涛:《国家文学的想象和实践——以〈人民文学〉为中心的考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该研究者的相关研究文章主要还有:“关于《人民文学》的复刊”,《当代作家评论》2(2004):122-27;“组稿:文学书写的无形之手——以《人民文学》(1949—1966)为中心的考察”,《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2006):20-27;“文艺整风学习运动(1951-1952)与《人民文学》”,《南方文坛》3(2006):60-69;“中国当代‘国家文学’概说——以《人民文学》为中心的考察”,《文艺争鸣》2(2007):131-36;“《人民文学》的政治性格和‘文学政治’策略”,《文艺争鸣》10(2009):37-40。

⑦此为集体笔名,取“人们同怀周总理之意”,共有十六人参与。有人在参与诗歌的收集过程中被捕。具体参见黎之:“回忆与思考:《天安门诗抄》出版前后”,《新文学史料》2(2001):140-47。

⑧如“大跃进”期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参考资料”和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门化1955级集体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当代部分纲要》(此本只有内部铅印本,未正式出版。其他在六十年代初出版的主要当代文学史还有山东大学中文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稿》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十年来的中国新文学》)。文学思潮类的资料汇编有杭州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组编《当代文艺思潮斗争史资料》(1972)、山西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编写的《当代文学思想斗争资料汇编》(1973)等。

⑨洪子诚谈到在1967到1969年间,一种“大事记”的历史叙述体式在各地被“造反派”组织不断翻印。参考洪子诚:“思想、语言的化约与清理”,《我的阅读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164。

⑩可惜的是它们大部分都还无法面世。如在1957年召开的共27次的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上,当时大陆几乎全部知名作家、艺术家都做了批判发言。会议记录包括被批判者的发言、检讨等共一百多万字,当时一小部分在整理后曾打印成册发到部分参加者手里,后又被收回,至今未见公开。见洪子诚:“历史承担的意义”,《我的阅读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29。

⑪吴秀明、陈建新主编:《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与史料选》(上、下)(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其中上卷为现代文学卷,陈建新主编;下卷为当代文学卷,吴秀明主编。

⑫当代部分有:中国文联出版社,张炯主编《中国新文艺大系1949-1966理论史料集》,1994年;李庚、许觉民主编《中国新文艺大系1976-1982理论一集上》、《中国新文艺大系1976-1982理论一集下》,1988年;朱寨主编《中国新文艺大系1976-1982理论二集》,1986年;王朝闻主编《中国新文艺大系1976-1982理论三集》,1986年。

⑬包括:丁景唐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1949-1976第19集史料·索引卷1》、《中国新文学大系1949-1976第20集史料·索引卷2》,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王蒙、王元化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1976-2000第29集史料·索引卷1》、《中国新文学大系1976-2000第30集史料·索引卷2》,2009年。

⑭刘福春主编:《中国新诗书刊总目》(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年)。该书收录了自1920年1月至2006年1月间出版的共18700余种汉语新诗集和诗论目录,并附有书籍说明和著者简介。

⑮刘增人等编:《中国现代文学期刊史论》(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该著作于下编中专辟“史料汇编”一项,内容包括期刊叙录、研究资料目录等。

⑯哑默以相当长的篇幅介绍了自己的写作历史,并披露了大量从未公开发表的“潜在诗歌”,详见:“当代‘潜在写作’史料:关于哑默《真与美》的史料”,《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1(2005):189-216;2(2005):231-59;1(2006):299-337。

⑰黎之,李世涛采访:“我接触过的周扬、林默涵和胡乔木”,《新文学史料》1(2011):70-98。

⑱蒋祖林:“回忆母亲丁玲——一九五七年前后”,连载于《新文学史料》3(1997):116-17,119-22;4(1997):40-52,83;1(1998):50-59;2(1998):141-51。

⑲黄药眠口述,蔡彻撰写:《黄药眠口述自传》(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⑳陈明口述,查振科、李向东整理:《我与丁玲五十年》(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

㉑周艾若口述,李菁整理:“口述:我的父亲周扬”,《三联生活周刊》17(2009):100-07。

㉒傅光明:《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山东: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傅光明、郑实:《老舍之死口述实录》(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

㉓李润霞:“‘潜在写作’研究中的史料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3(2001):270-80。

㉔宋剑华:“艺术拯救历史的经典范本——关于小说《铁道游击队》背景资料的真实性问题”,《广东社会科学》2(2011):175-81。

㉕陈子善:“关于当代文学史中‘潜在写作’的史料考证”,《复旦大学出版社建社二十周年书评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161。

㉖刘福春:“新诗史料工作的问题与学术规范的确立”,《中华读书报》2002年3月20日。

####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面对历史的挑战:当代中国文学史料学研究笔谈·编者按”,《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与信息》2(1991):3。

[“Editor’s Note. Facing the Historical Challenges: Written Forum on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The Information and Reference Material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2 (1991): 3.]

陈全黎:“文学口述史:理论与实践”,《云南社会科学》6(2009):151。

[Chen, Quanli. “The Oral History of Literature: Theory and Practice.” *Social Sciences in Yunnan* 6 (2009): 151.]

樊骏:“这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新文学史料》1(1989):65, 71。

[Fan, Jun. “A Magnificent Systematic Project: A General Survey of the Historical Documents Stud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Chinese New Literature* 1 (1989): 65, 71.]

洪子诚:《我的阅读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Hong, Zicheng. *My Reading History*.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1.]

霍俊明:《当代新诗写作问题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

[Huo, Junming. *A Study on the Problems in Contemporary New Poetry Writing*. Ph. D. diss.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2006.]

李洁非:《典型文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

[Li, Jiefei. *Typical Cases in Chinese Literature*.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10.]

刘增杰:《云起云飞: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研究透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

[Liu, Zengjie. *Inside the Study of Chinese Literature Trends*



- in 20th Century. Shanghai: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s Publishing House, 1997. ]
- 裘锡圭:“中国古典学重建中应该注意的问题”,载《中国出土文献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
- [ Qiu, Xigui. “Issues Arisen from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Study of Chinese Classics.” *Ten Remarks on Ancient Materials Unearthed in China*.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ress, 2004. ]
- 薇思瓦纳珊编:《权力、政治与文化——萨义德访谈录》,单德兴译。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
- [ Viswanathan, ed. *Power, Politics, and Culture: Interviews with Edward W. Said*. Trans. Shan Dexing.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6. ]
- 王本朝:《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年。
- [ Wang, Benzhaoh. *A Study on the Institution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Beijing: Newstar Press, 2007. ]
- 王春林:“读李洁非的《典型文案》”,《文学评论》3(2011):202。
- [ Wang, Chunlin. “Reading Li Jiefei’s *Typical Cases in Chinese Literature*.” *Literature Review* 3 (2011): 202. ]
- 王俊:“史料的落脚点在哪里”,《长江学术》2(2009):166。
- [ Wang, Jun. “Where Is the Foothold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Yangtze River Academic* 2 (2009): 166. ]
- 王瑶:“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随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4(1980):16。
- [ Wang, Yao. “Thoughts on the Research Work in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tudies* 4 (1980): 16. ]
- 韦勒克 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
- [ Wellek, R., and A. Warren. *Theory of Literature*. Trans. Liu Xiangyu, et al.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84. ]
- 武新军:《意识形态结构与中国当代文学——〈文艺报〉(1949—1989)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 [ Wu, Xinjun. *The Structure of Ideology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A Study on Newspaper of Literature and Art (1949 – 1989)*.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10. ]
- 吴秀明:“当代文学学科建设与史料意识的自觉”,《福建论坛》8(2011):119。
- [ Wu, Xiuming. “The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of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and the Consciousness about Historical Materials.” *Fujian Tribune* 8 (2011): 119. ]
- 吴秀明 赵卫东:“应当重视当代文学的史料建设”,《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5(2005):50,52。
- [ Wu, Xiuming, and Zhao, Weidong. “The Archiving of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Need Serious Attentio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tudies* 5 (2005): 50, 52. ]
- 谢冕:“误解的‘空白’”,《文艺争鸣》2(1993):30。
- [ Xie, Mian. “The Misunderstood ‘Blank’.” *Literature and Art Contention* 2 (1993): 30. ]
- 谢泳:“中国当代文学史叙述中的史料拓展问题——以1951年刘盛亚《再生记》事件为例”,《文艺研究》12(2010):75。
- [ Xie, Yong. “A Study on the Problem about Excavating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as Exemplified by the Incident of Liu Yasheng’s *Re-birth*.” *Literature & Art Studies* 12 (2010): 75. ]
- :《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法》。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 [ — — —. *Research Methods of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Guangxi: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10. ]
- 谢有顺:“接近那些复杂的灵魂——《中国当代作家评传丛书》序”,《南方文坛》1(2005):61。
- [ Xie, Youshun. “Approaching to Those Complicated Souls.” *Southern Cultural Forum* 1 (2005): 61. ]

(责任编辑:王嘉军)